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

周桂钊

一 老问题需要新思考

现在全世界许多人人都知道哥伦布航海,而知道郑和航海的人却很少。至于这两次航海的意义如何,许多人就更加不太清楚了。十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河殇》。这个《河殇》对郑和航海的评价是:“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因此《河殇》作者不无遗憾地说:“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与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河殇》用黑格尔的话,对中国人,对航海家郑和,作出“不能选择历史”的批评。而对于哥伦布航海则是怎样的评价呢?在西方,普遍的看法是赞扬,高度的赞扬!有的说他们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有的说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甚至认为“哥伦布以前的欧、亚洲人跨越大洋的活动没有留下翔实的记载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只是到哥伦布时代,在欧洲才出现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记载的越洋航海活动。”^①这种意见,不是个别人的意见,它反映了欧洲人对哥伦布航海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对全世界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老问题,还需要有新的思考。

^① 《哥伦布首航美洲》,张至善编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8月,第3页。

二 关于基本事实的探讨

哥伦布《航海日记》记载了他的航海目的与具体情况。对于这次航海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欧洲人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这就为欧洲以后的发财、发展、富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由于欧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欧洲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曾严重损害了美洲人,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利益。欧洲人称霸世界的同时,也损害了非洲、亚洲以及澳洲本土人的利益。后来的欧洲人说那时的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在美洲大陆生活了几千年,传了数百代的印第安人却始终没有“发现”这块新大陆。岂非咄咄怪事!又说欧洲人“发现”美洲,是世界地理大发现。亚洲人“发现”非洲,为什么就不是地理大发现呢?欧洲人怎么就跟亚洲人不一样呢?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哥伦布以前,“欧、亚洲人跨越大洋的活动没有留下翔实的记载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吗?中国人跨越印度洋,到达非洲,怎么没留下“翔实的记载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有了规模大得多的远洋航海的翔实记载,并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郑和航海。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小名三宝)和王景弘率领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造六十二艘大船,长44丈(合146米多),宽18丈(合60米)。还有其他小一点的船只,总共有二百多艘,远航西洋。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先到福建,再从福州五虎门起航。五虎门在闽江入海口南岸,今属长乐市。首先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然后依次到达亚洲、非洲许多国家。《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赏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从此以后,二十八年中,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

《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1日发表范传贤的文章《郑和下西洋的划时代意义》。文中说:郑和远航“比之欧人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等的洲际远航,无论在时间上、规模上、装备上、通商贸易上、闯过的水域上,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到达最远处,文中说:“冲出亚洲,遍历西太平洋、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东北非洲,分踪(舟宗)曾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远及西南非洲海域。”《上海经济报》2002年3月6日报道,英国业余历史学者孟席斯发现,中国明朝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带领的船队,要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大陆,也比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提早一个世纪进入人类的首次环球航行。这里说的比哥伦布早72年,是郑和第五次航海的时间。也就是说,范传贤认为郑和船队曾有小船绕过好望角;英国学者孟席斯又发现郑和船队在第五次航行时曾经跨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后人盛传“三保太监下西洋”,史书称为“明初盛事”(《明史》卷三〇四)。后来,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经常夸耀郑和航海的功绩。长期以来,郑和航海成为民族的骄傲,中华的光彩。东南亚诸国还流传着许多郑和航海的故事,也保存着纪念郑和的遗迹,并举行各种纪念郑和的活动。如“在印度尼西亚三宝瓏,建有三宝公庙,供奉郑和的塑像,作为保护神来祀奉,该地还有三宝井、三宝洞、三宝墩;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至今仍屹立着巍峨的三宝庙,香火甚旺,受人膜拜,又有三宝山、三宝山及三宝井;在泰国大城有三宝公寺,在吞武里有三宝佛寺。这些地方,每逢年节,当地人民和华侨竞相抬着郑和的舆像,举行赛神一般的盛会,影响所及,使各地游客深为感动。”^①以上这些事实与记载,难道不是郑和航海“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吗。

三 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的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讲,郑和第一次航海的时间在明永乐三年即公

^① 林金枝、张莲英《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见《郑和与福建》第3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

元1405年,比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时间(公元1492年)早了八十七年。

其次,关于航海的规模 and 影响。郑和在二十八年中,七次下西洋,二百多艘海船,浩浩荡荡,两万多人的庞大队伍,往返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三十多个国家,航程数万里。能说它没有“对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吗?欧洲中心主义者以为“世界上任何重大发现与发明,都不可能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但是,奇怪的是,哥伦布率领87人,驾三艘小舢板,横跨大西洋,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记载”的活动,而郑和率领三百倍于哥伦布的人员,驾二百多艘比哥伦布船大得多的远洋海船,七次下西洋,却不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记载”的活动。这是什么道理呀!?

第三,航海者与沿途各国人民的关系。《哥伦布首航美洲》书中虽然也承认“哥伦布航海的殖民主义性质”以及“后来几个世纪中发生的残酷历史事态”,但书中同时又说:“不是哥伦布作此壮举,也终会有他人进行类似的活动,其对原始部落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也不可能比哥伦布好,甚至更糟。这是必然的推理。”糟糕的是后面的推理。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欧洲人就到那里开辟殖民地,对还处于原始部落的印第安人进行残酷杀戮和迫害。如果欧洲的其他人“发现”美洲,也许与哥伦布“发现”的后果差不多。这是我可以同意的。但是,如果是中国人到那里,很难说就“不可能比哥伦布好,甚至更糟。”我以为,上述的这个推理“未必然”。很明显的事实是,郑和率领的中国人比当时的欧洲人强大得多,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就没有任意杀戮沿途各国的人民,也没有肆意掠夺他们的财物。“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渤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明史·郑和传》)与沿途各国礼尚往来,收到很多奇珍异宝,同时送出去的礼品也很多,其中有丝绸、瓷器、茶叶以及各种金银制品。收到的礼物有“狮子、金

钱豹、大西马、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花福禄、千里骆驼并驼鸡、糜里羔兽。”还有一些香料、珍珠、玛瑙、象牙、沉香木、紫檀木等珍宝、药材、建筑材料、日常用品。总之,“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天妃灵应之记》碑文)以后,中国人与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有许多来往,并没有出现欧洲人在美洲所制造的“残酷历史事态”。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还在纪念郑和航海,不知道美国的印第安人是否也在纪念欧洲人对他们的统治?

四 应该引出的启示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亚非一带的人民比较文明开放,不像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愚昧野蛮。但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又过几百年以后,这一带人民更文明、更进步了,却遭到西方来的殖民主义者残酷的奴役和剥削。那些强盗经常用炮舰来逼迫这些国家的人民服从他们的意志,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条没有道义和公正可言的强盗逻辑。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使他们完全陷入了被侮辱、被欺凌的境地。这是否表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关键在于强势群体,而不在于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没有能力控制局面,没有主动权。如果强势群体很野蛮,并且总是将生物界的“优胜劣汰”的法则误当作社会法则,总想在上帝面前奴役别人,企图淘汰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别人,那么,一边出现霸权主义,另一边就必然要产生它的副产品——恐怖主义。如果强势群体讲文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得到关心、帮助、支持,他们会非常感激帮助他们的群体,于是就能相互配合,共同建设美好的人间。贫富强弱,都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幸福地生活,这对谁都有好处。这叫合则两利,离则俱伤。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很多穷人没有解放,富人也难得解放。因为穷人无法生活下去,就会铤而走险,自然就会给富人带来麻烦,带来不安宁,带来精神负担。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大同”理

想,就已经提出“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失去劳动能力而又失去依靠的弱势群体,若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幸福地生活下去,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弱势群体都能幸福生活,其他人当然更不用发愁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才富了一两百年的国家难以领会这种助人为乐的思想境界,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武力和财富,动不动就对别国进行武器威胁与经济制裁。从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东西方经济与科技的差别,也看到了东西方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方面的巨大差别。

从历史上看,走出国门,远涉海外,与异国他邦交往,早在郑和之前就有诸多记载。如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法,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到中国传教都是显例。他们的初衷主要都是为了宣传宗教,但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鉴真和尚到日本传布律宗,同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等介绍到日本,现在还流传《鉴真上人秘方》。鉴真和尚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公认的。利玛窦到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为中国与欧洲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到中国之前,郑和航海这一轰动世界的壮举,可能已经将中国的信息间接地传到欧洲,这才引来一批意大利天主教徒。世界历史上这种文化交流的使者很多,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玄奘和鉴真,都是伟大的人物,都是令人敬佩的。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郑和率领数万人航海,其贡献和影响,比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更卓越,更有意义,影响也更大。西方“优胜劣汰”的观念对于经济发展、科学进步都有促进作用,而中国“和而不同”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共同发展都有协调作用。这两种作用可以互补。现在有些人企图用武力征服弱者,结果以乱治乱,越治越乱。迷信武力的人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营养,于人有利,于己也有利,何乐而不为。